

KANGDE SANDA PIPAN HEJI

[德] 康 德 / 著
邓晓芒 / 译
杨祖陶 / 校



康德

三大批判合集

KANGDE SANDA PIPAN HEJI

上

 人民 出 版 社

合 集 序

我与杨祖陶老师通力合作七年译出的康德三大批判于2004年出齐,至今又有五年了。在这五年中,我听到了不少赞誉,也收到了很多有益的意见。对于赞誉,我将它们视为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鼓励,实际上我知道这个译本还远不是那么完善,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而对于各方面来的意见,我在这里要表示由衷的感谢。这些意见,有些是来自素不相识的读者,通过来信或发电子邮件向我表达了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另外还有大量的意见是在我讲解康德哲学原著的研究生课堂上由研究生们提出来的。多年来,由于我逐字逐句地解读康德的著作,并要求研究生们对照德文和英文原版对我们的翻译进行字斟句酌,我在课堂上收获了数以百计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经过我的再思考,大部分都被我采纳并反映在后来的多次重印中了(因此,越是读到后面批次印本的读者,所读的文本就越精确)。例如这次将三大批判集结为《合集》再版,我所提供的再修改目录(包括我自己提出的和学生提出的)总共达三百多处。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心里很不踏实,因为我的康德哲学课并没有结束,所涉及的地方,仅限于《纯粹理性批判》中收入到《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中的那二十多万字,以及《实践理性批判》的前一部分、《判断力批判》中的一小部分,其他未涉及的部分都没有来得及再作这样仔细的重新审查。当然,我也知道,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大师的作品,我们中国人恐怕要经历好几代翻译家的埋头苦干,才有可能逐渐接近理想的译本,任何单个人的努力只能视为前进路上的路标。由此我深感任重而道远。

另外要说明的是,我们翻译康德的著作,原本就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即我和杨祖陶先生共同合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而萌发的一个念头。就我来说,首次意识到国内康德著作翻译状况的严

重问题则更早地要追溯到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1982年)(该论文于1997年以《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题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康德著作译文大都由我本人根据德文本重译。不过那时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自己来全部重译康德的三大批判。所以后来我和杨老师真正着手来干这件大事,最终目的仍然是想要弄清康德哲学到底说了些什么,而不仅仅是为国内研究康德的人提供一个比较信得过的译本。因此,甚至还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就已经开始把翻译的最初成果运用在教学中了。自2000年起,我的“德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研究生课就开始以我们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1999年)中的译文为教材,一方面是锤炼译文,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讲课来加深理解。这门课用7年时间共14个学期连续讲解,到2006年底完成了《精粹》中的《纯粹理性批判》部分20余万字的解读,所留下的录音资料经整理成文有两百多万字(基本上是用十句话解读康德一句),即将由人民出版社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为书名出版。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的讲解,估计还需要三年(六学期)才能将《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中的这一部分讲完。我的一个主要的想法是,中国人翻译西学经典,目的不在于将西方所有的宝贝都收入麾下,而在于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理解西方思想的真谛。因此我的研究是以翻译为基础的研究,而我的翻译是以研究为基础的翻译。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翻译完三大批判之后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三大批判的解读的原因。我认为,翻译做得再好,再成功,如果没有相应的解读,也是白费力气。

而这种解读则是为了提升中国人的思维能力。我在长期的研究和思考中,深感中国人在思维能力方面的薄弱,缺乏思维训练,更缺乏强韧的逻辑头脑。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所重视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东西,如情感、情绪、体验和习惯等等。中国人的头脑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中,在里面沉醉和陶醉,当然也可以获得一些诗意和感悟,但无法应付更广阔的现代生活。在这方面,康德哲学无疑是一部极为便利的教科书,它可以训练我们懂得如何进行严格的、有条理的思考。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不得不佩服他论证自己观点的那种严谨和深刻,那

种层层递进和秩序井然,那种面面俱到而滴水不漏。多年来我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授并让他们注意的就是这个,对康德的具体观点的介绍倒在其次。人们常说,绕过康德不会有好的哲学,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直到今天,认真地、深入地阅读和读懂康德,还是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的最好办法。这当然不是什么赶时髦的事情,而是一个愿意作哲学思考的人所不得不下的一番苦工夫。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于康德哲学似乎也有一个小小的热潮,关于康德哲学的书和译本在市面上销得不错。这与目前国际上对康德的重新重视有关,但也说明我国学者对康德哲学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值得庆幸的。我希望这不只是又一种过眼烟云的热闹,而是中国人真正肯花心思来正眼看待西方学术思想、领会西方文化精神的一个信号。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个一二十年,我国的学术事业和学术水平就会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达到能够真正与西方一流学者平等对话的境界。

邓晓芒

2009年1月20日于珞珈山

纯粹理性批判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von Raymund Schmid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Hamburg 1956, Nachdruck 1976.

根据 Raymund Schmidt 编《哲学丛书》第 37a 卷，
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 1956 年版，1976 年重印本。

《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

康德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是其三大批判著作，也是其全部哲学著述中意义最为特殊和重大的巨著。正是这部巨著开始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哲学革命，改变了整个西方哲学前进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整个批判哲学体系以及往后的全部哲学研究工作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也正是这部巨著，成了康德哲学对后世直到当代西方哲学方方面面的经久不衰的深刻影响的最本原的源泉。人们常说康德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源泉”^①，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②，人们在这样说时，心目中首先想到的和所指的毫无疑问就是康德的这部巨著。因此，英国的著名康德哲学专家、《纯粹理性批判》第四个英译本^③的译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一书的作者康蒲·斯密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十分正确地宣称：“《纯粹理性批判》是哲学史中转折点上的一部经典著作。”^④

《纯粹理性批判》的完成不是一朝一夕，甚或三年五载之功。它是康德从1770年起长达11年之久的潜心研究、上下求索、反复尝试、千锤百炼和呕心沥血的成果。它初版于1781年，再版于1787年，第二版对第一版的某些部分做了重大的修改，甚至重写。后世研究康德哲

① 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施太格谬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页。

③ 迄今有五个《纯粹理性批判》的英语全译本，它们依次是：F. Haywood本（1838年）；J. M. D. Meikle John本（1855年）；Max Müller本（1881年）；N. K. Smith本（1929年）；W. S. Pluhar本（1996年）。

④ 康蒲·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第2页。

学的学者,有的推崇和强调第一版,有的推崇和强调第二版,但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一致同意必须把两个版本结合起来研究,不可有所偏废。所以,后来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单行本,无论是德文本或其他文字的译本,一般都是把两版的异文全部包含在内的合刊本,并在栏外注明版次和页次——以 A 代表第一版,以 B 代表第二版, A、B 之后的数字则指该原版的页码。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贯彻始终的根本指导思想或一条主线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由此可见,《纯粹理性批判》的使命是为真正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而这样性质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属于一般形而上学,但本身并不就是形而上学,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入门”、“初阶”或“导论”。由于康德把只涉及知识的先天要素即先天的知识形式而不涉及对象的一切知识都称为先验的知识,所以他认为“纯粹理性批判”这样一种研究应称为“先验的批判”。^① 这种先验的批判属于先验哲学,“它是先验哲学的完备的理念,但还不就是这种先验哲学本身。”^②

《纯粹理性批判》全书除了序言和一个总的导言外,分为“先验要素论”和“先验方法论”,前者占全书约 4/5 的篇幅,是全书的主体部分,讨论人类认识能力中的先天要素;后者讨论在这些先天要素基础上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形式条件。人类认识能力由作为接受性的直观能力的感性和作为自发性的思维能力的理性这样两类原则上不同而又彼此联系的认识能力构成,因而“先验要素论”就区分为讨论感性的先天要素的“先验感性论”和讨论(广义的)理性的先天要素的“先验逻辑”。由于人类的思维能力有知性、判断力和(狭义的)理性这样三个

① A12 即 B26。

② A14 即 B28。

彼此不同而又相互联结的环节,因而“先验逻辑”就区分为讨论知性和判断力的先天要素的“先验分析论”(“真理的逻辑”)——其中讨论知性的先天概念(范畴)的称为“概念分析论”,讨论判断力的法规即知性的先天原理的称为“原理分析论”——和讨论理性的先验理念和先验幻相的“先验辩证论”(“幻相的逻辑”)。

第一版序主要阐明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确定一般形而上学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和规定其源流、范围和界限。第二版序主要阐明对理性进行批判所遵循的“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这一“哥白尼式变革”原理的来源、内容和意义。

导言提出了全书的总纲:纯粹理性批判的总任务是要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又扩展了知识内容的真正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并将这个总问题分解为如下四个依次回答的问题:数学知识如何可能?自然科学如何可能?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如何可能?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

先验感性论阐明,只有通过人的感性认识能力(接受能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去整理由自在之物刺激感官而引起的感觉材料,才能获得确定的感性知识,空间和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是数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和条件。

先验逻辑的导言阐明感性必须与知性结合,直观必须与思维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即自然科学知识,因而必须有一门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先验逻辑来探讨知性的结构及其运用于经验对象时的各种原理,包括这种运用的限度。先验逻辑立足于知识与对象的关系,即知识的内容,而不是单纯的思维形式,这标志着辩证逻辑在近代的萌芽。

先验分析论(真理的逻辑)中阐明了知性的先天概念和先天原理是自然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根据和条件。在概念分析论中,通过对知性在判断中的逻辑机能(形式逻辑中一般判断形式的分类)的分析,康德发现了知性的十二个(对)先天的纯粹概念即范畴;通过对范畴的“先验演绎”则阐明了,知性从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出发,运用范畴去综合感性提供的经验材料,这是一切可能的经验和经验对象之所以可

能的条件,从而证明了范畴在经验即现象的范畴内的普遍必然的有效性。原理分析论主要阐明了知性指导判断力把范畴运用于现象的法规:判断力是用普遍(规则)去统摄特殊(事例)的能力;范畴运用于现象必须以时间图型为中介;通过时间图型把先天感性要素统摄于范畴之下所产生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知性的先天原理,亦即判断力的法规。依照范畴表,知性先天原理的体系由“直观的公理”、“知觉的预测”、“经验的类比”和“一般经验思维的公设”所构成,而经验的类比中的“实体的持存性原理”、“按照因果律的时间相继的原理”和“按照交互作用律(在空间中)并存的原理”是作为自然科学的最根本的基础的三条最普遍的原理,也就是自然界(作为现象)的三条最普遍的规律。知性的先天原理只是对现象有效,对超越现象的自在之物或本体则无效,严格划分可知的现象和可思而不可知的本体的界限是“纯粹理性批判”的最根本的要求。

先验辩证论(幻相的逻辑)主要阐明了理性不可避免地要超越现象去认识超验的本体,由此产生的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些先验的幻相,而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康德在这部分的导言中指出,理性这种推理的能力由于要从有条件者出发通过推论去认识无条件者,这种自然倾向就成了先验幻相的来源和所在地,即它把由于推论的主观需要而产生的有关无条件者的概念看做了有客观实在的对象与之相应的实体概念了。先验的理念就是理性关于这类无条件者(如灵魂、世界整体和上帝)的概念,这样三个先验的理念起着一种为知识的经验认识提供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以引导其不断前进、并达到越来越大的统一的调节性(范导性)的作用。纯粹理性的辩证推论就是理性力图运用只对经验、现象有效的范畴来认识上述三个无条件者即超验对象的推论,这样的推论相应地有三种:关于灵魂作了含有“四名词”错误的“谬误推理”,关于世界整体陷入了由两组截然相反的判断彼此对立冲突的“二律背反”,关于上帝则推出了一些无客观实在性的“先验理想”。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属于先验幻相的假知识而已。

先验方法论首先阐明,纯粹理性的经验使用虽然有正确使用的法

规(知性的先天原理),但其理论的(思辨的、先验的)使用却没有法规可言,因而必须对其先验使用的方法(从定义出发的独断论方法、从正反两方争辩并互相证伪的怀疑论方法、还有假设和证明的方法等四个方面)加以“训练”,确立一些“消极的”规则,以限制纯粹理性扩充到可能经验之外的倾向,从而为建立一种有关经验或现象的“内在的”自然形而上学准备了方法论的原则。其次阐明,与纯粹理性的理论的使用相反,其实践的使用则是正确使用的法规的,这就是道德法则;那些理论理性所不能认识的超验的对象如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可以成为实践理性所追求的对象,因而对它们有“实践的知识”,即信念或信仰,这就为人类道德生活和幸福的和谐统一从而达到“至善”提供了前提,这就说明一种超验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可能的。此外,康德还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出发,说明了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的总体构成(以“批判”为导论,以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为主体),特别是自然形而上学的总体构成。

* * *

《纯粹理性批判》在国内已有四个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仁源本,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续印)的蓝公武本,1983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本,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卓民本。胡译本是康德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自有其意义和作用。但这个本子只包括1787年第二版的内容,缺少第二版中删去了的1781年第一版的内容;且由于对康德的哲学术语和概念缺乏深入切实的理解,译文在不少地方欠准确;译文表述上虽然用的是当时的白话文,但也已陈旧而不合现代汉语的习惯。蓝译本译于1933年—1935年,直到1957年才刊行,自那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它是中国大陆唯一正式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全译本,流传颇广,不少对康德哲学有兴趣的人都是通过这个译本来了解这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及其全貌的。但这个译本的最重要的缺陷就是译文用的是文言文,这是现代读者一般难

以接受的,使用起来也极为不便。牟译本的译者评注是一大特色,但译文所使用的近乎半文半白的文字和对康德哲学术语的个人色彩较浓的译法也偏离了一般读者(特别是大陆读者)的习惯。韦译本的初稿于1962年译出,直到1991年才经曹方久教授等人校订整理出版。这个本子是用现代汉语译出的,对康德的某些术语、概念虽有译者异于通常的译法,但仍明白易懂,所加注释也有益于增进理解,从而使康德这部艰深难读的著作对于中国读者初次有了可读性,这是我国康德译事中明显的进展。但是,包括韦译本在内的所有这些译本的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它们都不是从德文原本而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最多仅以德文版本作参考,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英译本的限制,难以摆脱英译本的种种缺陷,如行文与德文原本出入较大,错漏较多,译意不明确和欠准确,甚或与德文的原意相左之处也不鲜见。显然,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译本很难令有志于进一步学习和了解康德哲学的中国读者们满意,更不用说满足对康德这部巨著作深入研究的人的迫切需要了。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译本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五个中译本,它不同于前面四个译本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从德文原本直接移译过来的。这个译本从最初的尝试到最终的脱稿经历了差不多近十年的时间。

1993年到1995年,我和邓晓芒教授计划共同撰写一部逐章逐节解说康德这部巨著的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①。这样性质的著作不可避免地要有大量的原文引述。鉴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现有几个中译本的情况,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引文均须从德文原本重新译出”。这个决定是有基础的,因为负责提供《指要》初稿的邓晓芒当时已经翻译出版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两部著作,具有这方面的翻译经验。尽管这样,重译引文的决定仍然大大增加了我们撰写《指要》一书的工作量。不过,这个最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杨祖陶、邓晓芒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人民出版社2002年再版。

初的尝试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从德文原本译出《纯粹理性批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加真切地领会到了翻译康德此书的那些冗长、复杂、晦涩难懂的文句的困难和艰辛,但同时也增强了我们有朝一日能够把这部巨著较忠实地翻译出来的信心和信念。

这样的机会不久就降临了。1997年初,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女士约请我们编写一个“康德读本”,在确定这个读本的内容为康德三大批判著作的选本后,我们决定所选部分全部从德文原本重新译出。当时的想法是:“对于康德三大批判著作译本的现状,学术界和青年学子们都深感遗憾。如果这个选本仍旧利用现有的译本,那是绝对不会有丝毫改善的。因此,我们决心走一条费力的、可以说是自找苦吃的道路,要求这本书的全部译文都根据德文原著重新译过来。”经过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部直接从德文原本译出的40万字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①,其中《纯粹理性批判》部分占了全书的约1/2的篇幅。

《精粹》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它立刻为一些高校指定为研究生的教材。许多青年研究者和学术界老专家都迫切希望我们能在《精粹》的基础上译出三大批判的全本,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全译本。一位西方哲学专家在得到《精粹》后随即在来信中向我们提出了“一点想法”,颇具代表性:“对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一极其重要的经典著作,迄今我国尚无从德文原文翻译过来的全译本……现在二位先生既然已经精译了约一半多,何不乘胜前进,将它全译出来,以填补此项空白而满足我国学界之迫切需要!这无疑将是一项里程碑意义的更伟大的历史贡献,此乃后学们衷心仰求于二位先生者。”另一位专家也在《读书》上发表评论说:“两位作者既已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完成了一部《精粹》选本,曷不再再接再厉,提供给读者三部完

^①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上述引文见“编者序言”第32页。

整的批判?”^①学术界同仁对于得到从德文原本直接译出的《纯粹理性批判》全译本的这种渴望,对于我们的这种厚望和信赖,我们能够无动于衷而淡然置之吗?何况通译康德三大批判著作实在也是我们长久以来的心愿,甚至是多年来我们视为不可推卸而应勉力承担的一种职责。我们的想法得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样,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不惜投入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连续奋战,力求尽快地完成这一巨大的系统工程。自《精粹》交稿后,又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终于胜利在望了。在这期间,我们先送出了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的译稿^②,目前《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译稿也都脱稿,相信不久就可以全部与广大读者和学术界同仁见面了。此时此刻涌上我们心头的,可以说是一种比《精粹》交稿时更为巨大更为深沉的“完成了应负的一项使命的愉悦感”!

三大批判著作的译稿,无论是其选本(《精粹》),还是三个全译本,都来之不易。它们的完成首先要归功于译者邓晓芒译出的初稿和最后的订正定稿。他是在电脑中译出初稿的,要在电脑中以这样的速度直接从德文原本译出三大批判著作的初稿,没有对康德哲学的深厚理解,没有娴熟地掌握德语,没有精通现代汉语表达功能的功夫,没有沉下心来为学术而学术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是无从谈起的。每当我接到初译稿的样稿时,我都为能如此直白地译出难懂难译的康德式文句,仿佛是(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康德在用现代汉语道白自己的哲学思想似的,而感到一种异常的惊喜和慰藉,赞叹有加。但是,由于一种挥之不去的对康德、对学术、对读者也对译者负责的心态,我又不得不根据德文原本,参考不止一种英译本(特别在校订《纯粹理性批判》译稿时是如此)和中译本,再三推敲,用铅笔(这原是为了便于译者对校者的意见作取舍或变通)对初稿进行了逐一仔细的校订,以致(诚如译者在《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序”中所言)“在初稿上用极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

^① 见《读书》,2003年第3期,何兆武文:《重读康德》。

^②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版。

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每当我把校订完的译稿交给译者时,我都感到有一种内心的不安,我真不知道他在电脑中将如何根据校订的样稿进行最后的订正和定稿,留给他的显然不是一件轻松自如的工作,做起来也许比他直接翻译起来还更加不易。这时我也出现过下次再不这么挑剔的念头或决心。可是当我执笔校订新的初译稿时,却又鬼使神差地一头栽了进去,什么念头和决心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仍是“积习难返”,以致结果依然如故。在这么多年的合作过程中,我的这些彼此矛盾的心态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交替着。现在,面对即将全部竣工的庞大工程,无论我怎样高兴、兴奋乃至激动,我都无法去掉心里由于过分执着而加给译者以过分负担的那份歉意。最后还要说明的是,为每一部批判著作编制词汇译名索引和人名索引的繁重工作,也是由译者独自一人完成的。

这部《纯粹理性批判》的翻译所依据的主要是德文《哲学丛书》第37a卷,Raymund Schmidt编,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1956年版,1976年重印(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von Raymund Schmid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Hamburg 1956, Nachdruck 1976),这个本子所收录的各家各派知名康德专家的大量校订意见对研究和理解康德此书大有帮助。此外还参照了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著作集》第3、4卷,柏林1968年版,及《康德全集》著作部分,第3、4卷,柏林1911年版(Kants Werke, Akademie Textausgabe III. IV, Berlin, 1968;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von der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III. IV, Berlin, 1911);《哲学丛书》第37卷,Theodor Valentiner编,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莱比锡1919年版(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von Theodor Valentiner,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Leipzig 1919);英译本参考了康蒲·斯密本(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orman Kemp Smith,收入《西学经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校译所依据的主要是阿底克斯编注的《纯粹理性批判》(Immanuel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mit einer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Hrsg. Dr. Erich Adickes, Mayer & Müller, Berlin, 1889);还参考了米

勒的英译本修订第2版(Immanuel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s. F. Max Müller, 2d, revised ed. Macmillan, New York, 1924), 和普鲁哈尔的最新英译本(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s. Werner S. Pluhar,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Indianapolis/Cambridge, 1996)。此外, 在翻译和校订过程中还参考了蓝公武和韦卓民两位先生的中译本, 得益于这两个译本、尤其是韦译本处甚多, 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康德的著作, 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以文字晦涩、语句复杂、概念歧义繁多著称, 我们的译文也受到我们的德语水平和对原著义理的理解水平的限制, 疏漏、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一切方式的批评和指正, 以便改进和完善这个译本。

杨 祖 陶

2003年6月于珞珈山

维鲁兰姆男爵培根 《伟大的复兴》序

“对于我自己,我不想说什么。至于这里涉及到的那桩事业,那么我希望它将不会被视为只是某种意见的表达,而是被视为一件正当的工作,人们在从事它时可以相信,它不是什么单纯为了建立某个宗派或辩护某种偶然的念头的事,而是为了奠定人类一般福利和尊严的基础。希望每个人因此都可以在其最独特的兴趣中……考虑这一普遍的福利……并予以支持。最后,希望人人都能对我们的这一复兴表示良好的信任,相信它决不会显得无穷渺茫和超出人力,因为事实上它是无休止的错误的结束和正当限度。”^{①②}

① 该段文字是第二版加上去的,省略号为康德从培根的文章中删去的部分。——德文编者

② 培根引文原为拉丁文,后附德文译文。——译者